

考证 比较 鉴赏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集

相浦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6-06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证 比较 鉴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集/相浦杲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8

ISBN 7-301-02973-X

. 考... . 相... . 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
I206-53

书 名：考证 比较 鉴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集

著作责任者：相浦杲著

责任编辑：胡双宝

标准书号：ISBN 7-301-02180-1/ I·296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印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 25 印张 28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0 . 50 元

出版说明

相浦杲先生(1926—1990)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涉及语言、文学诸多领域,而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业绩尤为显著。先生生前曾来北京大学访问、讲学,与王瑶教授等学者交谊深厚。承蒙相浦绫子夫人的信任与支持,我们谨把先生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汇为一编,翻译出版。

厦门大学中文系庄钟庆教授为此书的翻译编选做了许多工作,谨此致谢。

目 录

序 王 瑶	1
自序	5
编后纪叙 庄钟庆	6
王国维的文学观	1
关于《小说月报》的研究	13
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鲁迅、胡适、陈独秀	45
鲁迅小说的一个侧面	
——谈《药》	59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考察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	87
鲁迅与厨川白村	113
茅盾的《腐蚀》	153
日记文学《莎菲女士的日记》与《狂人日记》	
《腐蚀》的异同	167
《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我在霞村的时候》	177
关于王蒙的《蝴蝶》	187
通过小说看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意识	201
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	

——通过日本文学来看	233
文学交叉——海峡两岸中国文学与日本	247
罗曼·罗兰与中国文学	267
 中国古典的世界	 (325)
 相浦杲著作编年目录(相浦绫子编)	 (337)
相浦杲年谱(相浦绫子编)	(343)

序

王 瑶

相浦杲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当我初次读他所著的《现代中国文学》专著的时候,就感到他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学讲起,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当代文学,虽然处理的时间较长,但作者以文艺思潮的历史演变统贯全书,言简意赅,确实是很有功力和见解的一部著作。以后又看到一些他翻译的中国作品如王蒙的《蝴蝶》等书。由于我的日语能力很差,只能勉强阅读,因此并未搜求他的其他作品,对他的学术造诣了解不深。后来在他访华时曾有幸在北京会晤,他的汉语说得很流利,交谈十分融洽。1984年我赴日本讲学,蒙相浦杲先生盛情邀往他在京都附近的宇治市别墅,并留宿一夜,交谈了许多关于东西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他的精辟见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主人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和热情,更使我十分感动,当时我就想要设法读他的许多研究论著,现在有了中译本,使我终于如愿以偿。读毕之后,我深为相浦杲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而感动。我似乎懂得了,相浦杲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热情正是建筑在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理解基础上的。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路的人又少得很。”(《呐喊 捷克译本序言》)在消除国与国之间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造成的隔膜,“沟通”普通人民的心灵方面,文学原是可以

发挥其特殊作用的。相浦杲先生通过他的研究把中国文学介绍给日本读者;而今天中国的读者又可以借助于相浦杲先生著作的中译本,了解“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文学”,这对于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无疑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因此,我们要感谢相浦杲先生,以及本书的中译者,他们的研究与翻译,为实现“中国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作了极其有益的工作。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相浦杲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观察,无论其观察角度与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都会有启迪的意义。就我阅读本书的初步印象说,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似乎有两个特殊的注意点。首先是借助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来观察、了解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结构与人民意识。这不仅反映了渴望了解中国现状的日本知识界的需要,而且也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特点的一种认识与把握;正如相浦杲先生所说,“当代中国文学所立足以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为基础的,其社会结构和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的意识内容都较为明朗,时常反映出其本质性的方面”,中国作家“对中国农村的现实和生活了如指掌,他们笔下所展现的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活生生的真实的必需的材料”。收入本书中的《通过小说看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意识》一文,就是通过发表于1979—1981年间的《乡场上》(何士光)、《焦老旦和熊员外》(李志君)、《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高晓声)等小说,对同一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及其引起的社会结构和农民意识的深刻变化,作出了颇为独到的社会学分析的。置身于这种变革之中的中国读者和研究工作者,不仅会为作者判断、分析的准确和所具有一定深度感到惊异,而且会对论文所自觉采取的“跨学科领域的综合研究的新方法”产生兴趣。诚然,正如作者一再申明,这“不是纯文学的批评文章”;但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将文学的批评研究与社会学的批评研究二者结合起来的问题,

这也是我国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这种意义上,中日两国学者在运用类似研究中的得与失,都是可以互相启发的。

从本书中还可以看到,中日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注意中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中日两国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影响,本来源远流长,到现代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世纪以来两国文化的发展又存在许多类似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因为日本首先成为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上世纪末起,它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文化的“窗口”,这样,立足于日本现代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化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所受到的包括日本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的影响,是有特殊方便之处的。日本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自然更为中国学者所注目。本书中有不少文章都属于这类比较的研究,也有更多的创造性的建树。例如《鲁迅小说的一个侧面》一文关于鲁迅在本世纪初对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观察与同一时期以二叶亭四迷为代表的日本作家对安特莱夫的接受的比较,《王国维的文学观》、《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鲁迅、胡适、陈独秀》二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王国维、梁启超、鲁迅在本世纪初的文艺观与作为日本现代文学发端者的坪内逍遙的文艺观及其影响、作用的比较,都属此类。《关于鲁迅的散文诗集 野草》,则以日本《苦闷的象征》一书为中心,对《野草》所受中外文学的广泛影响作了综合的考察,《文学交叉》一文则站在日本的立场对海峡两岸的中国文学作了考察,这些都会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而且是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的。中日两国在这种学术交流中,互相取长补短,不但能加深彼此的理解,而且必将把中国文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因此我愿意借此机会写下我读后的初步感受,并把此书推荐给中国读者。

1987年4月10日于北京大学

自序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能有中文译本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庄钟庆教授来信催促我为中译本论文集作序,又喜又惊!作为一个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能有书籍在中国出版,无论如何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庆幸的事。我在扶桑亦不能不为之雀跃。

从青年时期起,我一直从事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迄今已过去了四十多年。文学是观看社会舞台的窗口,是打开人生奥秘的钥匙,是历史发展步履维艰的足迹。我四十多年的文学探索也历尽艰难险阻。在这坎坷历程中,我记下了不少文字,现结为集子,奉献给中国读者。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是我四十多年来中国文学探索的一个见证。

近年来,日中学术交流频繁,常有机会同中国同行交流学术观点,发表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见解。庄钟庆教授见部分论文后,怂恿整理翻译出版,以使更多中国同行得以参考,也直接为日中两国文化交流工作做出贡献。承庄钟庆教授斡旋,决定出版。更蒙北京大学王瑶教授泼墨作序,使本书增光不少。在此还要向本书的译者和关心本书出版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相浦杲

1987年4月20日
于日本,京都,宇治

编后纪叙

庄钟庆

当这部论文集交付出版时,心头颇不宁静,令人遗憾的是作者相浦杲教授与作序者王瑶教授均先后逝世了。但在遗憾之中仍然感到庆幸,几年来这部有着不平凡的经历的书,终于将在大陆与中国读者见面了,怎不叫人兴奋?

我之所以关心这部著作的出版,还得从我同相浦杲教授的交往谈起。1983年初,有一位青年学者想到他那里访问、学习,研讨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便来同我商量,希望我给他写一封信,介绍教学与科研情况。我说:相浦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我是有所闻的,也读过他的一些论著,只是素不相熟,冒昧写信给他,好不好?几经斟酌,我还是给他写了信,他很快地给我回信,他说:“久仰先生大名”,“有缘能和先生纸上交往,使我很高兴”。又说嘱托之事,一定关照。读罢来信,深感相浦先生为人谦逊、坦诚。经他多方努力,那位青年学者终于如愿以偿地到他那里学习,结业后考上京都大学硕士生,又进了博士科。相浦先生为这位青年人不断进取精神感到高兴。他说:我支持中国青年学者到日本访问、进修,小者是成全个人的志愿,大者是为了促使日中的文化交流。

八十年代初期,厦门大学领导对于开展与国外学者学术交流的工作非常重视。据此,我曾向当时中文系主任郑朝宗教授建议,邀请日本和美国的几位知名学者到我系讲学,很快得到领导的支

持。相浦先生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来到厦门大学讲学的。那时,他为中文系师生作了三次报告,讲述了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概况,发表了他对鲁迅、丁玲作品的看法,时有新颖的见解,充分表现了他热心中日文学交流的精神,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正如他所说的:“每次讲学,课堂上都坐满了许多热心的老师、学生,这使我感到无限欢喜和光荣,我将终生难忘。”(《一座有人缘的幽美城市》)

相浦先生在紧张的讲学之余,不倦地进行各种有关学术研究的的活动,他参观了鲁迅纪念馆,还详细地了解鲁迅当年在厦大的情况,追寻鲁迅的遗踪,还探访著名作家、厦大兼职教授丁玲先生、陈明先生,现代作家、翻译家、厦大教授徐霞村先生以及当时准备参加全国丁玲创作讨论会的作家陈登科等先生,向他们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相浦先生说,同丁玲等作家交谈后,获得了许多文字上看不到的新材料,有助于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相浦先生这种深入调查研究的学风,令人敬佩!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界了解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见解,推进中外文学交流,我曾向一家出版社建议出版外国学者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价值的论著,征得同意,拟出版相浦先生论中国文学的论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并同他谈了论集编选的设想、建议翻译的人选等,他非常高兴。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把题为《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文学》书稿寄给我,内容包括阐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评价鲁迅、茅盾、丁玲等人作品,还论及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文艺观。相浦先生希望我为他的论文集写序言,我表示撰一读后感,并征得他的同意,请王瑶先生作序。王先生答应我的请求,我便将文稿编排好寄给他。他很快地就连同序言寄来。由于种种原因,相浦先生论文集没能出版,相浦先生生前,我曾托人跟他说明因由,我一直为此深为不安。相浦先生逝世后,相浦夫人对于相浦先生论文集的出版极为关注,她提出如果大陆出版不了,将译稿寄回,准备拿到别的

地方出版。我写信同她商量,表示一定会多想办法,争取在大陆别的出版社出版。随后,相浦夫人和她的长男相浦聪先生得知北京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相浦先生的论文集,他们嘱李庆国先生写信给我,希望征得我的同意,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问题。由于王中忱先生的沟通,我就与该社张文定先生顺利地商谈相浦杲先生论集出版事宜,对此,相浦夫人和我,对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其中特别是张文定先生的努力,均深表谢意!

相浦先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王瑶先生在为他的论文集作的序言说得好,王先生说,相浦先生的论著“对于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为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作出极其有益的工作”。王先生还认为相浦先生观察中国文学的角度与方法,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启迪意义。“首先是借助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来观察、了解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结构与人民意识”。相浦先生自己也说过,“文学是观看社会舞台的窗口,是打开人生奥秘的钥匙,是历史发展步履维艰的足迹”(《自序》)。王先生还指出相浦先生善于从中日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角度来观察中国文学。相浦先生重视对日中文学的比较,曾得到王先生的肯定(《缅怀王瑶先生》)。

相浦先生学识渊博,文风严谨,有着开拓创新的学术品格。他运用比较文学方法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是有其目的性的,决非为比较而比较,例如对鲁迅《野草》的分析,能从广泛的比较中揭示其独立性,并指出在世界文学中的价值,他在比较鲁迅的《狂人日记》与茅盾的《腐蚀》时,从日记体异同入手联系作品结构安排、内容传达进行比较,然后揭示各自不同特色,这同那种脱离作品实际单纯作技巧的分析大相径庭!相浦先生善于以大量材料论证富有创造性的见解,这是严肃的研究者为之追求的学术境界!

这本论集最初目录经我初步编排后,由相浦先生于1987年4月审定并作自序,这次正式出版又增收部分文稿,系根据相浦夫人

建议并由她提供的。全书论文,有的是相浦杲先生用中文写的,有些是选用国内刊物发表的译文,有些是约请胡金定先生译的,并经相浦先生校订,有些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组织翻译的。

相浦先生从青年时期直到生命终结,一直从事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为中日的文化交流作了不懈的努力。这本书论集的出版,便是他这方面劳绩的结晶!同时也将成为推进中日文化交往的助力!

谨向支持这本论集出版的相浦夫人及其家人,向北京大学出版社致以深切的敬意!

1993年2月于厦门大学

王国维的文学观

若是春归归合早
余春揽人怀抱

——蝶恋花

王国维(1877—1927)的文学观主要体现于《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时,他携家属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时年35岁。这个时期他的研究工作开始从哲学、文学转入国学。当时,罗振玉认为,他有必要研究国学,他亦认为以前所学都是“未醇”之学。行篋的一百多本《静安文集》尽可拿去烧掉。这在罗振玉的《海宁王忠愍公传》里可以看到。先不谈此事是否属实,他大概从这时起与以前研究的哲学、文学诀别。后来他写的《宋元戏曲史》(1913年完成,1915年刊出^[1])已不是纯文学批评,但这本书仍然留有他对文学感兴趣的痕迹。特别是对于古典戏剧确立了新的认识,开辟了有系统的宋元戏曲研究,属于他的文学观的另一方面。

王国维在《静安文集》的《自序》里说:

余之研究哲学始於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去夏所作《红楼梦评

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故并诸杂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云尔。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海宁王国维自序

光绪三十一年即 1905 年。从这篇自序里可以了解王国维倾心于哲学、文学研究是从 1901 年(25 岁)到 1911 年(35 岁)约 10 年间的青壮年时期。此后虽潜心研究国学，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宋元戏曲史》却仍留有他对文学感兴趣的痕迹。

王国维约用 10 年时间研究文学、哲学，取得如下的业绩。

一、《静安文集》。把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上的 13 篇论文和这个时期自作的古诗、今体诗 50 首(《静安诗稿》)汇集起来，取名《静安文集》，1905 年 9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静安文集续编》。他的学生赵万里把他后来发表在《教育世界》上的文章和他晚年的演讲稿(《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宋代之金石学》等)编集成一卷。

三、《人间词话》。1908 年开始连载于《国粹学报》(第 47 期至 50 期)。后来俞平伯加上标点，朴社印行(1926 年 2 月)。以后，赵万里把王国维未发表的稿子取名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刊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九卷三号)。罗振玉编《海宁王忠愍公遗书》时，把《人间词话》作为《上卷》，《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作为《下卷》，合并出版。

四、《人间词甲稿》。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他把近两三年作的《词》收集为《人间词甲稿》。

五、《人间词乙稿》。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他把这一年里作的“词”(60 余首)收集起来，题为《人间词乙稿》发表于《教育世界》。把《人间词甲稿》和《人间词乙稿》合并取名《苕华词》。

上述这些书籍是我们了解王国维文学观的重要材料。

王国维的光辉业绩主要在国学研究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年轻时学过的哲学、文学特别引起我们的兴趣。

《红楼梦评论》是立足于叔本华哲学来评论《红楼梦》的,同时也充分地表现出王国维的文学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即使这是外来理论,但是,向从来没有以哲学为基础系统地、而且那么精湛地对艺术,或者文学的“美”进行过论析。当然,这并不是说清朝以前没有像诗论、画论之类那样,对具体的个别的“美”。用丰富的言语来表达的敏锐见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采用这种传统的方法。但是,像《红楼梦评论》那样,专门在原理上追求人生与美的评论文字,以前却未曾有过。这在现代文学前史上有什么意义?占有什么地位呢?一般认为王国维与文学革命流派没有联系,而且是孤立的存在。这个问题姑且留在后面论述。

下面介绍一下由五章组成的《红楼梦评论》的主要论点。

所有人都有生活之欲。正因为如此,产生了欲望。人为了满足其欲望不断地努力着。努力是痛苦的。因此,人总是伴随着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只有否定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不过,这必须把自己置于利害之外,忘掉物与我的关系。这就是艺术(王国维有关“美术”的论语)。叔本华认为,艺术上的解脱是暂时性的,要达到永恒的解脱必须经过道德之路进入宗教境地。然而,“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优美”,一种是“壮美”。这两个词的定义王国维不但在《红楼梦评论》中谈过,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在此文中王国维使用“优美”和“宏壮”,在《人间词话》里也用)两篇论文中也谈过。

正如王国维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规定了美就是一种形式。所谓“优美”,是“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例如,自然及艺术中普通之美皆此类也。”与此相对,所谓的“壮美”(=“宏壮”),是“越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

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风、雷电、艺术中伟大之宫室、悲惨之雕刻像、历史画、戏曲、小说等皆是也。^[2]

规定人生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树立了“优美”、“壮美”的标准。企图用这种标准来再评价中国的艺术。“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红楼梦》。”

王国维认为,用哲学解释男女的问题,两千多年来只有叔本华的《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3]《红楼梦》作为小说触及了这个问题,并且给予解决。因为《红楼梦》一开头就对男女之爱予以神话的解释。也就是说,女娲氏补天时用剩下的石=玉(=主人公贾宝玉)象征着生活之欲。这样来描写男女之欲=生活的痛苦,表明生活之欲和生活之痛苦是自己造出来的,而且,以后解脱的路必须靠自己的手去开创。

《红楼梦》中的人物真正得到解脱的只有宝玉、惜春、紫鹃三人。但是,解脱也有两种方式。其一,用自己生活之痛苦的阅历得到解脱;其二,用卓越的智力洞察宇宙人生的本质,抛弃生活之欲而走上解脱之路。第二种必须是非凡的人才能够得到。惜春、紫鹃属第一种解脱,宝玉属第二种解脱。把这两种解脱比较如下:

惜春、紫鹃的解脱=超自然的、神明的、宗教的、和平的。

宝玉的解脱=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悲感的、壮美的,因而是文学性的、诗歌性的、小说性的。

因此,《红楼梦》的主人公不是惜春、紫鹃,而是宝玉。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可是,“吾国之文学中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可是,《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桃花扇》以写故国之戚,而